

文化与经济增长文献述评

蔡旺春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析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现代经济理论则日益关注传统经济增长因素背后的文化因素。本文从文化的概念开始、分别从宗教、制度、创新等视角对现代经济学在探讨文化影响经济增长方面进行了回顾与述评,并提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文化; 经济增长; 述评

中图分类号: F4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0)02-0173-05

Literature Review on Culture Ele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CAI Wang - chu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ory has mainly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labor, capital) and technologies on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 However, modern economic theory increasingl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e elements behind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Beginning from the concept of culture, this paper has reviewed and commented on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n, system and innovation respectively; and put forward the deficiencie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culture; economic growth; review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的概念是一个包含多元素的集合,长期以来,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者从各自的视角以及研究的目的出发,对文化给出了相应的定义。

第一次给文化一个整体性概念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其在1871年所写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1]他强调文化的熔铸性,但其文化定义缺少“物质文化”的内容。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文中,将文化定义为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他将文化概括为两个层面,一个为价值观念层

面,一个为科学技术层面。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所带来的价值。^[2]

经济学家对文化的认识不同于文化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者,他们往往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种可以进入某种经济函数而加以分析的因素、变量。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6)认为,“与‘制度’相并列,并且规定着该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中,有一个是‘文化’。‘文化’可以说是属于该经济社会的人们所公有的价值观。在经济(体制)模式分析中认为,人们的价值观已经为他的偏好所反映。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价值观也可以理解为属于该经济社会的多数人所共有的社会福利函数”。^[3]速水佑次郎和拉坦(1971)将“文化禀赋”作为诱导创新模型中的一个引申变量。他们认为,文化禀赋包括“经济学家们通常隐藏在偏好习惯之下的以及政治家们归于意识形态之中的那些因素”,这个词涵盖了由过去遗留下来

收稿日期: 2009-01-12

作者简介: 蔡旺春(1978—),女,湖北浠水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

的文化的各个方面。而经济学中的文化禀赋概念通常被划归在偏好的概念之下,宗教和意识形态也被包括在文化禀赋中。对于“文化”,他们使用了怀特给出的定义“当事情和事件被认为与人体有关时,它们构成行为;当它们被认为是相互联系时,它们成为了文化”。^[4]速水佑次郎(1998)还指出,“从广义上讲,制度以及技术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然而,狭义地讲,文化是指社会中人们的价值体系”。^[5]

费孝通(1946)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综合并补充了实物的文化现象。他认为文化定义应包含三个层次,即: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器物层次、社会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价值观念层次(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价值观念集合)。^[6]

从各个学科对文化的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文化”基本应该包含三个层次,即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这样看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涵盖了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包括要素(如生产工具)、技术、制度和价值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多学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只选取了其中的部分因素作为文化的代表。

二、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理论历来是经济学领域内最为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但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析了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其经济增长理论中缺少了文化因素的影子,现代经济理论则日益关注传统经济增长因素背后的文化因素。

1. 国外研究述评

(1) 宗教视角的文化与经济增长观

卡尔·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状况的反映。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04)则阐明,与马克思观点完全相反的关系也能够成立。他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详细论证了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基督教新教文化,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将这种“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7]即:新教具有节欲、勤劳和敬业传统,有利于提高积累和资本形成率,并与经济数字化管理的理性相符合,从而为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也是工业化首先在新教传统国家成功发动的原因。^[8]遵循韦伯的思路,日本的森岛通夫(1973)把日本经济的成功归因于西方科技和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主要是中国儒学和日本原有的神社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是指:敢于牺牲自我,以效忠自己的国家和天皇的集体主义精神。森岛认为,日本“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儒教^①的世俗化和日本的骑士气质

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9]“日本社会非常受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支配,由于这种特殊的伦理精神,日本的资本主义,相当偏离典型的自由企业制度”。^[10]

德龙(B. DeLong, 1988)运用计量的方法进一步来证实韦伯和森岛通夫的观点。他把新教定义为哑变量,放进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回归方程中,显示出这个虚拟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同时,运用实证的方法,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从1870年到1970年期间,相对于天主教为宗教主流的国家,新教为宗教主流的国家的人均收入高三分之一,并没有出现收入水平趋同。^[11]

邹恒甫(1993, 1991)建立了经济增长数理模型,并把宗教代表的文化要素纳入该模型中,在消费之外把财富和资本引入效用函数,得出的结论是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精神能提高一国的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又转化为高投资率和高的产量增长率。^{[12] [13]}

上述都基本是以宗教为主流的文化要素与经济增长观,即在探讨文化与经济增长时,将经济发展与宗教这一特定文化联系在一起,将文化(宗教)作为要素资本,分析了文化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而探讨文化资本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的关系。

(2) 制度视角的文化与经济增长观

文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有各个学科的贡献,但是最近西方的研究成果则集中体现在新制度经济学上,探讨文化对制度进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1990)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机制。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正式制约(例如法律)、非正式制约(例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诺斯通过经济史研究发现过去几千年的主流特征:世界逐渐演化成为了许多在宗教、种族、文化、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迥然不同的社会。富国与穷国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如往昔,可能还更甚于以往。因此他在分析框架中将制度融入到经济学与经济史中去,揭示制度在经济绩效中的作用,认为制度决定经济绩效,强调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时还特别强调以“文化”形式沉淀下来的非正规制度对个人行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的适应效率而非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同经济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其对交换与生产成本的影响来影响经济绩效。与所用技术一起,制度决定了构成总成本的交易费用和转形(生产)成本。他说“在制度的报酬不递增且市场完全竞争的世界里,制度是无足轻重的;但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制度是重要的。”^[14]

作为发展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刘易斯

① 森岛通夫又认为日本的儒教是不同于中国的儒教的。

(1955)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将制度研究引入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刘易斯认为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为。他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从个人的行为选择出发,研究国家财富增长的历史因素、制度原因、社会价值取向。借助于历史研究的方法,刘易斯肯定了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人类行为的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以及资本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因素则是制度。他从三个主要方面分析了制度:首先,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并强调了制度与经济活动、资本、知识的相互作用;其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界定了制度的功能;再次,强调了法律秩序以及所有权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一国形成了有利于(或)不利于增长的制度,这就要进入观念的领域,研究社会价值观,也就是文化要素的作用。他分析了文化决定经济主体对财富的态度,进而决定对获取财富的努力的态度,这两类态度决定了经济增长能否启动。^[5]

鲍尔斯(2004)依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从个人偏好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制度和偏好的相互影响和共生演化,从而解释了异质个体参与人如何互动,进而演化出一个社会秩序。鲍而斯的思路是,偏好异质且有限理性的个体,处于不同群体当中,作为群体的一员进行社会交往,在组群内部以及组群之间行动,为协调群组以及群组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个体通过互动形成规则,即制度,所以制度取决于个体的偏好。同时制度反过来会影响个体偏好,制度通过群体规范等形式来塑造个体偏好,这就表现出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决定。因此,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个体偏好和制度共生演化。^[6]

以上分析都是从制度的角度探讨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侧重于文化因素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诺斯分析了正规以及非正规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刘易斯从个人行为的选择出发,研究个人行为如何影响制度再过一步影响到经济增长;鲍尔斯更是依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从个人偏好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制度和偏好的相互影响和共生演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3) 创新视角的文化与经济增长观

熊彼特(1912)的发展观是建立在创新之上的,分析文化对创新的影响也就意味着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把企业家及其创新行为作为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认为正是企业家创新竞争导致的“创造性破坏”,形成经济中的企业产生、成长以及被新企业替代这样的动态过程,打破经济的循环流转,实现经济增长。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既研究了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文化也研究了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的文化。他认为,典型的企业家具有非享乐主义性质的心理——追求社会地位、征服的意志、创造的快乐,这些心理推而广之就是区域的文化,如果一个地区具有一种开放、

灵活、平等竞争的文化,则该地区就容易获得创新的成功。同时他又认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他认为,尽管传统习惯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巨大节约,但对于工商业者的创新而言却造成了“心灵方面”的困难。他说,做一种新的事情,不仅在客观上比做已经熟悉的、已经由经验检定的事情更加困难,而且个人会感到不愿意去做它,即使客观上的困难并不存在,也还是感到不愿意。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制约和规定作用。^[7]

刘易斯(1955)也认为,知识增长、技术进步的速率有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亦即文化对待创新的态度。在人们习惯于听取各种各样意见,或者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的地区,接受新观念是非常迅速的。反之,如果一个地区与世隔绝、傲慢自大或实行独裁,它在遇到新观念时就不大可能迅速吸收它。此外,如果新知识与本地流行的禁忌或信仰直接冲突,那么开展技术创新工作也会遇到困难。^[5]

威廉·鲍莫尔(2008)对企业家才能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分析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发现这些经济体令人羡慕的增长记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创新,而创新的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的压力迫使企业把产品和市场创新作为最重要的竞争手段。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中鲍莫尔特别指出,也许人们都有创新的本能,但这些企业家创新能力却可能因过高的税收、政府过多的干预、过于繁杂的法律、低下的行政效率,而被引导到寻租或其他非生产性活动上去了,增长最终依赖的是公平的规则和习惯,这些规则和习惯能够将人们的创新能力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这样才能有持续的增长。^[8]

创新正作为一个独立要素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而如何将创新引入到生产性的活动当中,以及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就要取决于一地的规则与文化。

2. 国内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个方面。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国内对经济增长的探讨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也日益得到关注。

(1) 东亚文化或儒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争论

蒋庆(2003)对韦伯命题进行质疑,强烈反对儒家伦理是发展障碍的说法,他竭力声明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认为,儒家文化中也有类似基督新教的工作伦理与天职观念,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也具有勤俭、敬业、节制、诚信、好储蓄等优良品质。^[9]梁燕城(1999)支持韦伯的观点,承认新教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认为

儒家文化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认为现代东亚文明的成功也可被解释为摒弃儒家、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果。^[20]

冯天瑜(1997)从“儒家资本主义”角度分析了有关东亚文化与经济增长关联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上世纪60年代以降,经济高速发展。上述东亚诸国家及地区,大体在儒教文化圈内,故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的资本主义”相对应,有“儒家资本主义”之称,其特色是以东方文化中的现世主义、国家主义、机会均等主义以及注重家族观念和个人修身,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原则、科学、追求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科技革命这两大契机,创造出震动世人视听的局面。^[21]

陈峰君(1999)认为,儒家传统文化是东亚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或“东方型或情感型模式”。这种情感型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一,东亚的企业与公司不仅是经济单位,而且是社会实体,它贯彻社会价值观念和保障社会团结。第二,东亚民族一向以勤俭持家、刻苦耐劳和储蓄而著称。第三,强调教育,重视智力投资。第四,倡导爱国主义、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以和为贵、宽容协调、求同存异、同舟共济等,这些精神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东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22]盛邦和(2002)将儒学乃至于一切东亚传统(经过转换与更新)中能激发当代经济活力的因素的总和,称为“东亚新儒学”或“东亚新文明”,认为它被证明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东亚发展发挥推力作用。^[23]东亚新文明与西方新教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这表现为它们都是现代工业精神、市民精神与合理化的世俗经济伦理。换言之,勤勉、节俭与职业伦理是两个“新教”的共通行伦理。^[24]吴建华(2004)也承认,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模式,儒家文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它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25]赵吉惠(2004)认为儒家伦理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对人的道德修养教育、和谐人际关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积极作用。^[26]

也有学者认为不能过分夸大儒家伦理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或者影响的程度。余新天(1997)认为,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甚至印度的发展中,必将会提出更广泛的文化动因问题,即使中华文化也不能仅以儒家来概括。^[27]刘力臻(2000)虽然承认儒教文化无可争辩地促进了战后东亚经济的繁荣,但却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最本质的根源。东亚经济崛起的最本质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儒教文化的作用(尽管它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根基之一),而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28]

(2) 文化影响经济增长原因和机制的研究

陈宪、韩太祥(2009)初步探讨了文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他们的观点是,文化要素通过影响企业家职业选择、企业管理者选择机制,影响企业层次生产率进而影响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文化作为知识资产,以其特有的方式进

入总生产函数,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路径;文化产业通过扩散效应和分工效应,促进总生产率的提高;文化与经济的共生演进会改变经济竞争和经济增长方式。^[29]

罗浩(2009)从文化因素中去寻找国富国穷和地区兴衰的根源,探讨了文化对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影响,揭示了文化对于经济增长绩效的间接作用。^[30]

高波(2007)应用文化成本与文化变迁理论对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停滞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认为三次文化变迁有效降低了人们的文化成本,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指出文化创新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31]林毅夫在1992年发表了《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一文。他认为通往官僚阶层的科举之路产生了虹吸效应,将优秀人才全部吸引到仕途为官之路上去了。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32]

李向民(1999)在其《精神经济》一书中认为,财富是被赋予人类精神的物质自然。认为生产从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必将带来未来经济的增长,并倡导交文化产业作为未来中国的支柱产业。^[33]

香港的霍韬晦(2000)教授认为,经济增长至少要具备五项条件:法制、管理、科技、态度(工作意识)、训练。法制和管理能保障生产不受非生产性的原因干扰或拖累。科技、态度、训练有直接提高生产力的效用。工作态度的培养与社会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有关,因此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问题。^[34]

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上述对文化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介绍和评价可知,人类对文化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解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为了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仍有许多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主流经济学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研究不足。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真实的“经济人”的行为动机是多样化的,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已经注意到了人的道德情感复杂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却将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了,这为研究复杂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也推动了经济学发展成为最具科学形式的社会学科。但是,当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学做出更为深入的解释时,就有必要对假设条件进行逐步放松,从而逐步回归现实世界。

第二,在研究领域上,对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或机制研究不够。虽然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用一种与主流经济学相一致的框架来分析文化因素影响经济增长

的机理,但无论是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的发展经济学还是新兴的制度经济学对于文化影响经济增长命题的研究,还主要是集中在特定文化因素是否对经济增长起作用。他们在解释这种促进或抑制作用的时候,大多还是列举简单的例子或一些文化表象的元素来说明,有待进一步运用严密逻辑的分析框架,揭示文化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对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缺乏广泛和精确的数理分析与检验。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另一方面是由于文化的分析缺乏正规的数据,没有任何一个数据集可以总结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因此这一议题的论述仍呈现一种散漫的风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忽略文化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一点。要对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更透彻的理解,有待进一步的建模和经验实证。

参考文献:

- [1] [英]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
- [2] 郭齐勇.文化学概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11~12.
- [3] [日本]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22.
- [4] [日本]速水佑次郎,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2~138.
- [5] [日本]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
- [6]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
- [7]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黄晓京,彭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 [8] 陈宪,韩太祥.文化要素、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九卷.50.
- [9] [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M].胡国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25.
- [10] [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M].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4.
- [11] J. Bradford De Long.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88.
- [12] Heng-fu Zou.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long-run growth. Th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s, No. 630, March 1991.
- [13] 邹恒甫.积累欲、节俭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3(2).
- [14]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30.

- [15] [美]W.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梁小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16] [美]J.S. 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M].江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17] [美]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18] [美]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M].刘卫,张春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 [19]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M].北京:三联书店,2003.364.
- [20] 王元化,李慎之,杜维明.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19~21.
- [21] 冯天瑜.人文论衡[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640.
- [22] 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6~347.
- [23] 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70.
- [24] 盛邦和,[日]井上聪.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40.
- [25] 吴建华.东亚现代化与中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37~238.
- [26] 赵惠惠.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25~325.
- [27] 余新天.东亚现代化的前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载罗荣渠,董正华.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6.
- [28] 刘力臻.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与“东亚模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40~242.
- [29] 陈宪,韩太祥.文化要素、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九卷.48~66.
- [30] 罗浩.文化与经济增长:一个初步框架[J].经济评论,2009,(2).113.
- [31] 高波.中国经济增长:一个文化变迁的分析框架[J].经济学研究,2007(7).17.
- [32]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 [33] 李向民.精神经济[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 [34] 祝瑞开.儒学与21世纪中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86.

(劲草 编)